

书评书介

东亚华商网络与华人社会：全球视野 与区域格局下的观照

——读庄国土、刘文正《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

王爱平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图分类号] D634.33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0)03-0068-05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中国大陆学术界有关华侨华人研究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 但总体来看, 大多是国别、地方研究或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侨乡等专题研究, 体现了民族国家框架下华侨华人研究的特点。^①近读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庄国土教授的新著《东亚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华商网络、移民和一体化趋势》,^②感觉该书在宏观层面系统梳理了广义的东亚(含东南亚和东北亚)华人社会产生和发展的脉络, 勾勒了东亚华人社会整体发展变化的历史轨迹, 是首部东亚华人社会整合研究的专著, 其研究视域和分析视角明显体现出与以往华侨华人研究不同的特点, 给人以诸多启发。

以往国内学术界对海外华人社会的研究, 多是由华侨到华人变迁的单线式的分析研究, 该书明显与此不同。全书对东亚华人社会考察研究重点之所在, 是以对东亚经贸圈和东亚华商网络的形成、调整和发展的考察为主线而展开的, 旨在阐明东亚经贸圈与华商网络及东亚华人社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互动及其进程与特征。

关于这一点, 作者的论证逻辑在于: 东亚经济贸易圈、华商网络与移民之间存在着互为作用的关系。作者认为, “海外华人高度集中在东亚地区, 尤其是东南亚地区。这一现象不但是地理因素使然, 更是东亚经济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所致”, 东亚商贸圈的主导力量, 恰是以海商为主的华商网络, 在 13—19 世纪中期长达 600 年的历史岁月中均如是。华商网络发展的最重要特点是与移民活动的互动,

[收稿日期] 2010-05-10

[作者简介] 王爱平, 女,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华文教育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① 廖赤阳、刘宏:《网络、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 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 年第 1 期。

② 以下简称《东亚华人社会》,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 年 9 月出版。由其博士研究生刘文正协助完成, 见该书后记。

尤其是 17 世纪以后，这种互动关系使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而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也使华商网络获得最可靠的支柱（该书第 2~4 页）。东亚华人社会因东亚经济贸易圈、华商网络的发展及其与中国移民之间的互动而形成，华商网络与中国移民之间的互动也一直影响着东亚华人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因此，该书对东亚华人社会形成、发展及变迁的研究，十分注重对其与中国互动历史的考察，并最终导归到对东亚华人经济体整合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展的关注和研究。

在全球视野和东亚区域格局的观照下，该书将华商网络的发展历史及其因与移民的互动而形成的东亚华人社会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并围绕这几个阶段展开分析论述。

13 至 19 世纪中叶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海商经贸网络和华人社会形成与发展时期。该书的第一篇“东亚华商网络、中国海外移民与华侨社会的形成”，即与第一阶段相对应，主要论述自 13 世纪至 19 世纪中叶以前东亚经贸圈、以海商为主的华商网络与海外移民的互动及东亚华侨社会的形成。作者认为，中国海商网络发展的最重要特点是其与移民活动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使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而中国海外移民的发展也使华商网络获得最可靠的支柱。到 14 世纪中后期，中国海商活跃在东亚各地商港，中国移民在爪哇和苏门答腊等地已形成大规模的华人社会。17 世纪前期以降，中国海商网络进入大发展时期。欧洲人东来带来的巨大商机，使华商海外贸易得到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移民规模及移民社会不断扩大，从北方的日本长崎到赤道附近的巴达维亚，华人社区遍布东亚各地。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是中国海商网络大调整和华人社会的转型时期。该书的第二篇“侨政和东亚华人社会的转型”，即与第二阶段相对应，主要论述分析清代以来的中国侨务政策、东亚各国对华人的政策与东亚华人社会的变迁及华人认同的进程。作者认为，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衰落迫使东亚华商网络进行大调整。华商网络的中心逐渐从中国东南沿海向海外转移，中国海商网络转型为海外华商网络。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移民社会的转型，即侨民社会逐渐整合入当地社会，作为华族而成为当地多元民族社会的组成部分。同时，华侨的政治认同也有了根本变化，转而在政治上效忠于当地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今为第三阶段，该书第三篇“东亚华人经济体崛起及其一体化趋势”，即与第三阶段相对应，主要考察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海外华商网络重新扩展到中国大陆以后的情况，并分析探讨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东亚华人经济体之间进一步整合的可能性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作用。作者认为，这一阶段中海外华商网络重新扩展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在海外华商网络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海外华商网络在中国大陆的覆盖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传统东亚华商网络的范围。与此相对应，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现中国人第四次移民东亚热潮，东亚各地密布华人社区，并再次呈现经贸与移民互动的情形。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其经济国际化程度的飞速发展，中国与东亚各经济体的交流和融合程度前所未有，其先导作用首先在于华人经济体之间的高度整合（见该书第 3~5 页）。

二

《东亚华人社会》是庄国土教授“近 10 年来对华人华侨研究的总结”（见该书后记）。该书有几个方面引人瞩目，值得关注。

首先，作为中国较早研究华商网络和“海洋中国”的学者之一，庄教授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①

^① 参见庄国土：《论早期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形成》，《厦门大学学报》1999 年第 3 期；庄国土：《论 15—19 世纪初海外华商经贸网络的发展》，《厦门大学学报》2000 年第 2 期；庄国土：《论 17—19 世纪闽南海商主导海外华商网络的原因》，《东南学术》2001 年第 3 期；庄国土：《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厦门大学学报》2005 年第 3 期等。

在该书中对东亚商贸圈和世界华商网络进行了新的整合研究和纵深研究。作者依据新发掘的资料,论证了当前的华商网络和东亚商贸区与历史上的华商网络和东亚商贸圈之间的渊源关系。作者指出,在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腾飞后,“在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中,传统的东亚商贸区再现活力。东盟‘10+3’建构的提出和实施,或可看作是东亚商贸圈的复兴”(该书第3页)。

其次,作者在书中专列一章“中国新移民前往东南亚的过程、原因和分布”,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移民”问题,以此论证历史上的华商网络、华人社会与当前华商网络、华人社会的承继关系,这是该书的一个较大贡献。在多年大规模田野调查^①和搜集掌握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作者梳理了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主要历史脉络和成因,将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新移民前往东南亚称为中国人移民东南亚的“第四次大潮”,并根据不同的目的地与移民的特点,又将其分为“三波”考察。第一波的新移民来自传统侨乡——闽南和潮汕地区,主要目的地是菲律宾和泰国;第二波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延续至今,主要目的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第三波启始于21世纪初年,主要前往缅甸北部、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北部等地,其数量之大远非前两波移民可比。在此基础上,作者对移往东亚各国新移民的数量和分布进行了统计和估算,提出进入东南亚的新移民达250万人以上,再加上韩国、日本的新移民,总数则达400万人,这是迄今关于当代中国移民研究的最新成果。

第三,注重考察分析中国和东亚各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特别是中国历代政府的侨务政策,并提出了引人思考的观点,充分反映了作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深厚积累。作者认为,中国的海洋发展和海外移民事业两度受挫于明初和清初中国政府的海外政策,并重申他五年前提出的、引起广泛反响的著名论断——“明初海洋政策和郑和下西洋是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见该书第一章第一节)。作者秉持其一贯观点,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的侨务政策给予客观和较高的评价,认为这些政策是华侨民族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作者还通过客观的学术研究对当前中国政府的海外华人专业人才政策提出了批评。作者认为,在世界华人资源与大陆相关资源整合的过程中,“海外专业人员的缺位不能不说是最大的遗憾”,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以提升专业人才的行政待遇作为对专业人才的价值肯定,其实是对专业人才价值的扭曲”,是“官本位”的表现,批评政府“缺乏对科学和知识的足够尊重和敬畏”。作者强调指出,如何吸引海外华人专业人才,将是中华民族腾飞的关键。“作为世界华人资源最重要部分的专业人才与中国大陆资源整合时,即是中华民族腾飞之日”(见该书第十四章和全书结论)。

第四,作者对东亚华人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及其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先导作用的论断很有说服力。以往国内外学者也注意到了华人经济体间的依赖和整合,但大多是从“大中华经济圈”观点出发,且缺少系统的实证研究支撑,往往引发对中国崛起及华人与中国关系的猜忌。该书以翔实的经贸、投资、劳动力流动等统计数据,论证了大陆、港、台、东南亚之间的经济整合不断加深的趋势,指出东亚华商网络和华人经济体间以中国大陆为中心的资源整合具有三个坚实的支点:

一是具有共同的文化。共同的亲缘、语言和表现在共同心理状态上(主要体现在价值观上)的文化基础,能使华商之间易于建立“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共同的文化背景也将更容易消解冲突,促进合作。正如西欧和北美的经济互相渗透与合作基础即是文化的一致性使然。

二是处在共同的东亚区域。相近的自然及地理条件和相互交往的交通便利,降低了物流和人流的

^① 庄国土教授和郭玉聪教授主持的“新移民研究”项目,以福建侨乡田野调查为主,得到国务院侨办、教育部社科基金、福建省侨办、福特基金和住友财团的支持。自2002年开始进行至今,除调查去美国、意大利等国的新移民外,也展开赴菲律宾、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尼、柬埔寨、新加坡等国的中国新移民的调查与研究。已汇编成《福建新移民调查资料》等。

成本。海外华商网络可视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一种方式，是在自然经济区域内的不同经济体的合作典范。

三是具有几百年的历史基础。明代以来形成的华商经贸网络基于共同的地域和文化基础，寻求共同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数百年来华商之间的联系长期维系，基本上一直能够为共同利益而聚合，尽管华商网络的中心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客观上都增强了东亚华人经济体间的整合。

因此，华商网络是当代东亚华人经济体整合的基础；东亚华人经济体的高度整合，并非政治操作的产物，也不会趋向于政治整合；这是以华商网络为基础的区域经济资源整合的表现，是超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经济合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逻辑结果。

总括全书，作者认为：中国大陆在东亚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中心的历史地位，推动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和中华制度文化的海外传播。海外贸易催生中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和华人社会的形成，移民与贸易成为华商网络的两大支柱，从而使华商网络成为东亚经贸和文化圈的主导力量数百年。虽然近代以来中国本土的衰落使东亚华商网络的中心转移到海外，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东亚华商网络迅速重返大陆，以大陆为核心进行东亚乃至全球华人的资源整合。在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东亚华人经济体的高度整合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先导和核心动力。

三

就研究方法而言，作者对东亚华人社会发展脉络、相互整合和发展趋势的探讨，力求依时叙事，表现出历史学的基本关怀，同时也融入了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一些相关概念和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研究。

该书关于海外华商网络、东亚华人社会发展历史与趋势的多种新论断，建立在把握国际学术发展前沿，不断吸收各相关学科新理论及其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对有关的学术理论、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诸如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亚洲交易圈”的理论，王赓武教授对华商、华人认同的研究，廖建裕教授关于华裔“再华化”的提法和印尼华人人数的考察，新加坡学者谢秀瑜等对区域化和区域主义的研究等，该书均有分析、探讨、回应或运用。

同时，作者的多种新论断也是扎扎实实地建立于翔实资料的基础上。据笔者粗略统计，该书引证各类资料超过 700 种，包括未刊、已刊档案和资料汇编 70 种，方志、古籍 91 种，前人文集、论著 270 种，译著、译文 59 种，外文著作 119 种，海外中西文报刊 40 余种，各类统计资料和会馆刊物 20 余种，中外官方机构和国际组织网站 70 余种。

该书十分重视实证和计量研究，并且重视新资料的发掘和资料的重新诠释。书中关于当代东亚华人的各种统计表格多达 60 余种。作者甚至注意到并大量搜集中国、东南亚以及其他国家各航空公司网站有关航班的资料，编制成统计表，以考察分析 80 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进入东南亚的各种影响因素。该书对新移民的研究还使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和访谈资料。近年来，作者和他的学术团队在福建侨乡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移民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考察研究那些通过合法渠道出国的移居者，而且关注诸如以游客身份入境逾期滞留定居者、非法滞留的中国劳务人员及非法购置移入国死亡人身份证的移居者等。那些非正常渠道移民的访谈资料，得来实属不易。总之，该书的资料价值也难能可贵。

四

读庄教授这部专著，也让我们反思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视角。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对中国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观（论）”或“中国中心主义”多有批评，提倡以海外华人为中心的“华人社会中心观”，主张在各华人居住国发展变化的脉络下把

握和研究华人主体；提倡从世界史和国际移民的角度、视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①这对提高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术水准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如吴小安教授所说，华侨华人研究中的“中国中心论”或中国中心主义，是指“一厢情愿地在中国自己的话语里，而与海外侨情变化发展的现实严重脱节”，^②这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者应该摒弃、警惕和避免的。但是，“视角”不等于“中心”。笔者以为，从中国视角出发的研究不等于“中国中心论”或“中国中心主义”。从研究视角来说，中国视角和华人居住国视角的研究对华侨华人研究都是必要的；这两种视角的研究也各有自己的局限性。不应将中国视角与华人居住国视角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在一项具体的研究中，或比较侧重从中国视角出发，或比较侧重从华人所在国视角出发，或者是同时进行两种视角的研究，应该都是可以的，这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而决定。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随着华人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华人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进一步认识到：无论是中国视角，还是华人所在国视角，其实都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都受制于以国家史观为中心的华侨华人史观。^③面对有些研究对象，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框架局限，从更广阔的视野加以观照。华侨华人研究，需要中国、东南亚（南洋）、东亚或亚洲、全球等多元的考察视野，需要多种视角的具体研究。对华商网络的研究即需如此——因为华商网络本身就是跨越国界的。庄教授的这本专著正体现出一种全球视野和区域格局下的超越性观照，一种跨越中国和华人居住国两者的多视角的研究。另外，不应将中国视角的研究视同于“中国政府立场”。作为中国的学者，不可能也不应该无视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现实意义。关键在于，在做具体研究时，应首先站在学者的立场，采用客观的分析视角，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性研究。

无庸讳言，该书有些部分是命题作文，奉命之作。^④庄教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在该书绪论中开宗明义，表明了他的学者立场和客观的研究态度。在表明该书研究具有认知中国最重要海外资源的现实意义之后，他强调指出“本书的目的并非说明中国应当如何利用华侨华人资源”（见该书第2页）。如前所述，作为客观的学术性研究，该书对郑和下西洋坚持与政府部门宣传导向迥然相异的想法，对政府的有关政策也多有批评。

总之，该书超越民族国家的地理界限和国史框架，突破以往研究中由华侨到华人的单线分析局限，全书视野开阔，既有纵向的历史考察与追溯，又有横向的东亚各国的分述与比较，在更广阔的视域中对东亚华人社会进行跨区域、跨学科、多视角的整合研究，这是十多年来作者及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学界力图拓宽学术研究视野的体现。

作者的研究总体上是宏观性的，尽管有大量翔实的统计资料和实证、计量研究，但读罢似有意犹未尽之感。以笔者管见，如能增加一些华商网络实体的个案研究，可能会使研究更充实。另外，在作者从多种视角出发的研究中，相比较而言，东亚当地社会的视角似稍显薄弱。

① 参见丘立本：《从世界看华人》，南岛出版社，2000年，第16～39页；[菲]洪玉华、吴文煊：《扩大华人研究的视野》，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② 吴小安：《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的观察与思考》，见《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特稿《建国六十年来华侨华人研究》。

③ 廖赤阳、刘宏：《网络、国家与亚洲地域秩序：华人研究之批判性反思》，《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

④ 该书是作者所主持的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台湾与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关系”、国务院侨办重点研究项目“世界华侨华人数量、分布与发展趋势”及“国家清史工程·华侨志”的阶段研究成果，见该书后记。